

生态语境中的双向阐释

——以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为例

王坤宇*

内容摘要 双向阐释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追求的一种理想样态。但是由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异,使得这种理想长期以来难以落地。随着生态话语在国际文化语境中渐趋凸显,中国文学获得了一个双向阐释和价值重估的机遇。陶渊明作为开一代先河的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这一文学传统都具有引领性的贡献,有可能成为这种双向阐释的突破口之一。鲁枢元先生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将陶渊明放置于古今中外生态文化的坐标系中,并以生态批评的新视野来为陶渊明其人其作进行重新定位;还以陶渊明的自然诗为中西生态文学对话的交叉点,进行了跨文化的双向阐释。不失为生态批评和比较文学领域一个较好的研究个案。

关键词 陶渊明 中西文化 生态语境 双向阐释 鲁枢元

乐黛云先生指出,双向阐释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层模式。^①这一模式自提出以来就成为很多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者的一个目标。阐释之于思想、艺术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正是在汉儒、宋儒、当代新儒家的阐释中,孔子的思想流传到了今天;也正是在奥古斯丁、阿奎那以及马丁·路德、加尔文和当代后现代宗教理论家的不断阐释中,基督教文化得以历久弥新。逝去的思想家、艺术家的思想及作品如幽灵般沿时间的线性之轴顺次播撒,当代的阐释者们为这些幽灵附上骨肉,使其成为一种“在场”的存在。

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西双向阐释是难于实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文艺理论作为高势能文明潮水般地涌入,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的滞后。长期以来,西方文论成为了中国文论的“启蒙者”,而拥有着数千年文学批评传统的中国文论界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播撒中沦落为“被照亮者”。因此,中国的文艺批评往往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演武场,在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乐黛云先生曾经叩问:“中国要发展文化影响力,应该拿什么来面对世界?如何面对世界?”^②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

*王坤宇,男,河北涿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生态批评。

^①相关的论述请参见乐黛云主编:《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

^②参见乐黛云在《文化大讲堂》的讲演,《人民日报》2012年6月7日。

的再阐释无疑是发展这种影响力的一种选择。而要使这种阐释发生国际性的影响，找寻一个具有普世通约性的对话窗口成为关键。

生态危机是当前全体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普世问题。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的传统，具有丰富的可资开掘的文化蕴藏。鲁枢元先生的新作《陶渊明的幽灵》正是以生态视角切入，将陶渊明放置于古今中外生态文学的坐标系中，试图以全球本土化和生态批评的大视野来为陶渊明其人其作进行重新定位，可谓一次生态视阈下的双向阐释的上佳尝试。笔者认为，本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生态语境下的价值重估

英国生态批评学者乔纳森·贝特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我们必须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走错了路？”^①近30年来，生态批评、环境伦理、环境批评、生态美学、生态文学^②异军突起，生态意识指导下的各种批评形式正在悄然成为文学批评的显学和热点。西方生态文学可追溯到卢梭的《爱弥尔》、梭罗的《瓦尔登湖》。西方生态哲学则可以追溯到卢梭、爱默生的自然主义思想，经由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进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最终进入当代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中国的“天人合一”、“以物比德”、“参天化育”、

“阴阳互动”、“齐物论”、“委任运化”等思想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具有当代生态批评的“整体论”的生态观。因此，中国的古典哲学^③天然地是与当代生态批评相通的。海德格尔发扬了荷尔德林的诗歌，将“诗意地栖居”的生态理想播撒到每一个生态研究者的心中。“人，虽然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大地之上”这一意境天然地和中国古代道家思想是何其相似。胡塞尔、黑塞、海德格尔等人所受道家的影响已经众所周知。陶渊明作为深谙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又留下了动人的自然田园诗歌的诗人，是与西方的倡导自然书写的哲人和作家对话的最好代表。

鲁枢元先生是中国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生态批评学者之一。^④在中国生态批评的语境中，曾繁仁先生的生态美学团队是一个得风气之先者，他们的建树主要体现为对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当代阐发。鲁枢元先生是另一个得风气之先者，他立足于文学的本体，以文学批评来介入文学事件。陶渊明研究正是他的这一研究样态的典型案例。

鲁枢元先生指出，陶渊明之所以可以放之于世界伟大诗人行列而无愧色，根源在于他对“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提交的令人满意的答卷。而这一“元问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鲁枢元先生总结出“委任运化”是诗人陶渊明的简洁回答，这一回答自然、自由、简单又质朴；却又更接近这一问题的本源。无论是采菊东篱时见南山，还是躬

^①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4.

^②这几组名词各有其生发的具体语境和指涉范围，笔者不拟在此对其做区分和辨析，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意识：生态意识。在接下来的行文中，笔者采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

^③事实上，生态意识方面，道家和儒家思想已经交织在一起，儒家的生态意识往往从道家中来，二者共同的《易经》传统是不能否认的。

^④鲁枢元是“生态文学学”的最早倡导者，编著了众多的生态文学研究论著。

耕南亩守拙归田；抑或是散居树下，听风饮酒，都来得潇潇洒洒，自自然然。另外，与单纯的哲性思考不同的是：“还由于他的解答是诗意的，因此就更蕴藉隽永，绵延悠长，无所不包和回味无穷。”鲁枢元先生接下来把陶渊明放在古今中外的大语境中，这大概在众多的陶渊明研究者中是第一次。他试图赋予陶渊明以世界级级别的价值。而这一世界级级别的价值有赖于当前生态意识日渐深入人心的语境。

为此，鲁枢元先生分析了汉文化圈中“自然”的含义和道家自然哲学的现代衍变，总结了钱穆、方东美、陈荣捷、杜维明等新儒家对于中国哲学与自然关系的看法。特别指出杜维明的新儒学新就新在运用现代生态学的“生态系统理论”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自然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阐释，从而打破了物质—精神、客观—主观二元对立的现代思维模式，打通了儒道两家贵有与崇无的壁垒，面对人类遭遇的史无前例的生态灾难，展开一幅中国式的宇宙论图像，这对于“后现代之后”的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和谐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双向阐释

如前所述，生态批评日益成为世界批评界的热点，这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生态传统的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但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所谓的双向阐释不应该是以西方的理论阐释中国的

文学或者是以中国的理论阐释西方的文学，^①而应是中西互阐互释、中西互体互用。

这种互体互用首先是哲学层面的。鲁枢元先生认为，“自然”是当代中西哲学遭逢的路口，诗哲^②陶渊明作为中西互阐互释的先行者当仁不让。陶渊明的抱拙守雌，突破社会樊笼的桎梏，一任自然的哲学观可说是当代生态哲学的先声。因此鲁枢元先生进而认为，陶渊明将会在中西哲学新的综合中，在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中再度现身；陶渊明的思想和诗歌也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支持这一论断，鲁枢元先生在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展开了双向阐释。在哲学层面，他认为海德格尔因其对道家“知白守黑”思想的阐释而与陶渊明在内在的哲学诉求上是一致的。

陶渊明的“返乡归田”就是“归其根”，几同于海德格尔的“回到本源近旁”，那里才是达成个体生命“诗意地栖居”之处。^③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思维是生态批评者都无法绕过的高峰，鲁枢元先生拈出了海德格尔直接讲到中国道家哲学《老子》第二十八章的史实，^④说明海德格尔受到“道法自然”的中国道家思想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陶渊明无疑是得道家三昧的一位代表作家。在道家哲学的管道中，海德格尔和陶渊明成为了互为主体（Inter-subject）的相互阐发者，只是因昔人已逝，这种阐发需要当代人代为完成。

在文学层面，鲁枢元先生应用了平行研究的手

^①比较文学的阐释研究在被台湾学者提出之初，被定义为以西方理论来做中国文学批评实践，显然，这种认识已经不再符合当下的时代语境。

^②这是鲁枢元先生的观点，陶渊明是否可以被看成哲学家，还有待商榷。

^③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④同上，第82页。

法，指出了陶渊明的创作与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内在关联。他首先对欧美“浪漫主义文学”作了重新界定，认为浪漫主义文学是对代表现代化思想的“启蒙文学”的反拨，其“美学”法则与“工业社会法则”格格不入，反科学主义，反官僚体制。而长期以来，中国语境中的“浪漫主义”文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被“阉割”的存在，成为了“大胆幻想”、“奇特夸张”、“神话色彩”等文学手法的代称。也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批评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郭沫若在建国后却摇身一变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陶渊明常常被排斥于浪漫主义文学之外的原因。而鲁枢元先生则认为，陶渊明的作品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是存在暗合的。

鲁枢元先生比较了华兹华斯的《致雏菊》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物我两化”的相通之境。这是中国式的天人合一，逃脱樊笼，复返自然的意境。他考证出，布莱认为陶渊明是华兹华斯的“精神祖先”。^①也因此，鲁枢元先生进而指出，广为人知的众多西方生态作家都可以被看成是与陶渊明志趣一致的“自然盟友”。

鲁枢元先生的这种阐释方式使得中西思想家和作家在自然（生态）意识的大背景下，互为表里，相互阐发。效果如何也许还可以再做考量，但这不失为一种“双向阐释”的尝试。

三、将陶渊明定位为世界生态文学的符号性人物

在生态危机难题面前，中国应该向世界提供一定的思想文化贡献，从而重建自己的文化形象。

陶渊明无疑是中国美丽精神的一个代表。但是，作为生活在1600多年前的一位中国诗人，如何将其人其作和当下的文学语境联系起来，这对于学者的叙述技巧提出了挑战。如前所述，鲁枢元先生首先把陶渊明放到了生态语境的大背景中。接下来，鲁枢元先生又巧妙地使用了德里达的“幽灵”（specter）的概念。陶渊明的时代语境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的精神或者说“气”仍然在播撒，不断点亮和启迪当下的存在。鲁枢元先生总结了上起沈约、萧统，中接梁启超、胡适，下迄袁行霈、罗宗强、王先霈等批评家对于陶渊明的认识和评价。陶渊明的诗歌还漂洋过海，影响了众多的西方哲学家和作家。从而让人信服地得出陶渊明的“幽灵”在不断地启迪各个时代的诗人和评论者的结论。

在该书的后半部分，鲁枢元先生下了“笨功夫”，对陶渊明的接受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使得其为陶渊明的新定位更加往来有自，有理有据。^②作者将中国文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分为三段：唐宋以前，明清时期和近代时期。以往，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陶渊明生前及死后初期文名寂寞，作者却考证出他的同代人颜延之就给予了他“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即超旷，无是非心”的评价，这已经把陶渊明的基本核心价值表述得很清楚了。之后不久的沈约和萧统等均对陶氏有着很高的评价。

15世纪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兴盛使得市民普遍的趣味在发财致富、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庐山瀑布、江陵猿声、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渐渐从文学艺术中消隐。人们更加关注人世，而远离了自然。又

^①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第102页。

^②也许是限于材料或篇幅，该书未能对国际上对于陶渊明的阐释情况进行细致梳理，这是未来一个可资开掘的方向。

由于蒙古和女真两次入主中原，激发了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悲怀，对于陶渊明的接受也不免染上此时汉儒的心理色彩，往往将陶渊明解读为“耻事二姓”的纯儒。鲁枢元先生反对这样的观点，认为事实上陶渊明脱离了人世之境而进入了“天地境界”。

进入近现代，对中国文学影响最著的胡适和鲁迅在接受陶渊明之时各存偏颇。陶渊明被胡适推崇的原因是符合其“平民性的白话文”标准。而鲁迅本着其改造国民性的原则，指出陶渊明并非如朱光潜所说是“浑身是静穆”。建国后的文学史著作中，陶渊明更是屡屡被封为“人民的代言人”，^①突出其政治性和阶级性的一面，并且扩展了鲁迅的关于陶渊明“金刚怒目”、“猛志固常在”的论述。^②

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陶渊明的研究虽然还在文史的考据疏证与会议的学术研讨中继续展开，甚至仍不乏赞誉之词，但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包括现实的文学创作界，陶渊明的身影却在不断地淡化。更有甚者，陈翔鹤因为写了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在1969年被批斗致死。陶渊明的生活方式、陶渊明的诗歌、陶渊明的研究于是逐渐凋零。

可喜的是，到了新时期，陶渊明得到了袁行霈、章培恒、骆玉明等学者的新评价，这可以看成是一次新的拨乱反正，但是陶渊明幽灵的真的复归

还是有赖于人们自然生态意识的提升。而这一点，鲁枢元先生在该书中作了有益的双向阐发，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

陶渊明1000多年的接受和阐释史可以说是历史鲜活的肉体，是中华民族之于自然的集体无意识的绵延和延异，而文学批评的使命在此就是招魂，使陶渊明的幽灵复归。

鲁枢元先生让人信服地认识到：“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他所代表的那种自然精神奠定的，而‘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意义，又是由陶渊明的文品和人格为象征的。陶渊明无疑成了自然在中国文学史演替、衍化过程中的一个标志。”^③

在生态文化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在比较文学的双向阐释下，陶渊明的幽灵正在复归。而且，这一复归不再是只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必将为世界的生态文学添砖加瓦，为世界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鲁枢元先生的这部著作，正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把陶渊明之于21世纪的世界文学的意义分析得较为透辟、深入；它契合了汤一介^④先生的“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建构的理念，不失为生态语境和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一次双向阐释的有益尝试。

责任编辑：沈洁

^①李长之：《陶渊明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②见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

^③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第172页。

^④修改此文时，惊闻汤一介先生病逝，心痛不已。